

一部惊心动魄的民族志

潘毅◎著 任焰◎译

中国女工

——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



梁文道：潘毅写了一本充满“社会想象力”的书。她能够得到社会上举足轻重的“米尔斯奖”，的确是实至名归。

本书曾获得社会科学界世界级权威“**美国 C. Wright Mills 2005 最佳书籍**”奖项，使潘毅成为自 1964 年该奖项创立以来的首位亚洲获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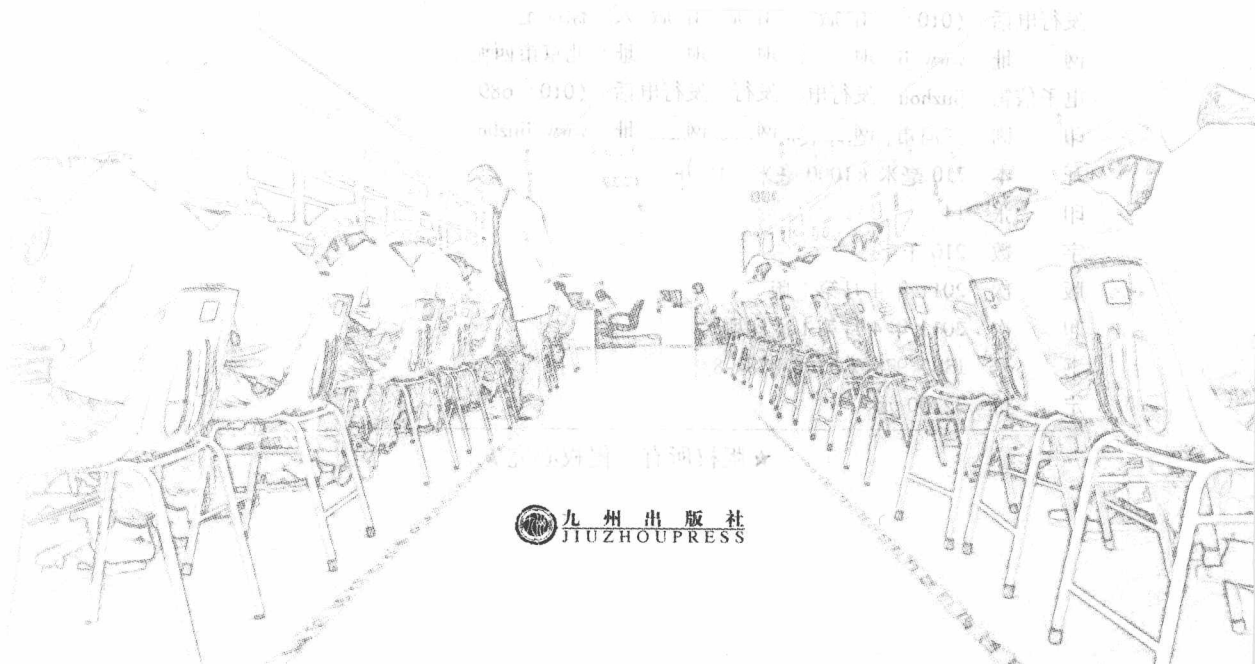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中国女工

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

潘毅◎著 任焰◎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T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潘毅著；任焰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108-0784-8

I. ①中… II. ①潘…②任… III. ①女性—劳动就业—研究—中国 IV. ①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4247 号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

作 者 潘毅 著 任焰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784-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导 言	1
是社会行动者？还是打工者主体？	7
打工者主体的生成	12
主体、欲望与抗争	13
田野地点和田野工作者	16
全书概述	19
第一章 国家与资本：中国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与消解	23
打工者主体新释	25
中国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与消解	29
清河村：一个农村公社的变迁	31
外来工城市——深圳	38
劳动力使用的技术	40
模糊的身份：工人力量的根除	44
第二章 背井离乡：农村女性的挣扎	49
城乡迁移与亲族网络	54
重述女性命运	60

夹缝中的挣扎：异化劳动与农村家庭生活之间	64
冬：“这不是我第一次出来打工。”	66
春：“有时候我不得不为自己活着。”	69
经历对立	72
第三章 社会性身体：规训与抗争的艺术	76
中国工人：“社会主义”的身体	78
空间的艺术：生产线上的定位	80
一种权力技术：装配流水线	85
速度、控制与反抗	90
规范劳动习惯：作息时间表	92
时间观念：1996年1月19日	94
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工厂守则	99
电子眼：全景敞视主义原则	106
第四章 当上打工妹：身份认同与差异的政治	109
摸索身份认同：上班第一天	111
不同的命运，不同的身份认同：美芳的到来	112
成为工人：城乡差异的政治	114
训导会上	118
地方及血缘——族群身份认同与不平等	121
工资制度与分化	124
日常的偏见与适应	127
语言与身份认同：车间的广东化	129
第五章 性与性别的想象	134
打工妹：非单一化的主体	136
渴望性主体	138
性与性化身体的泛滥	140

召唤性主体	143
性别分工	146
性倒错的身体 (perverted bodies)	151
女工打架	152
女人们的谈话	153
闲谈与说笑	156
消费主义欲望与现代自我	159
外出购物	161
第六章 工厂里的尖叫、梦魇与叛离	166
尖叫	168
个人创伤	169
慢性疼痛: 身体与工序	170
月经政治: 女性时间与工业时间	175
资本的阴谋诡计	179
阿英的痛楚: 在身体与社会之间	181
扭曲的自我	185
梦魇、尖叫与抗争	188
第七章 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	191
一种抗争次文体	193
多场域的抗争 (multisited resistance)	195
英文参考书目	199
中文参考书目	212
政府文件与出版物	213
报纸与杂志	214

导 言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出来的，我们村里来的女孩子们都死在大火里了。只有我活了下来。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幸运，能从鬼门关逃出来。

——工厂大火中一位幸存者的话

1993年的11月19日，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的一间港资玩具厂，这是一间专门为欧洲某著名玩具品牌公司进行产品加工的分包厂。80多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其中只有两名男性，其余均为女性。另外50多人被严重烧伤，还有20多人受轻伤。惨剧震惊了国际社会，也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就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遭受跨国资本的重创一般。^①大众传媒也仿佛突然之间才意识到，广大农民工，的确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惨重代价。这场大火给中国社会笃信资本和市场的现代性梦想，留下了永恒的伤疤。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既有希望与渴求的躁动，同时也充斥着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罪恶，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底层的牺牲经常被视为发展之必需。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我见到了晓明，一个在这场大火中，经历了与所有同乡姐妹们的生离死别而幸存下来的打工妹。正是她，

^① 中国的外商投资工业区的第一场大火发生于1990年5月，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东莞，一家专门为欧美市场进行出口加工的港资雨衣厂发生重大火灾，80多名工人葬身火海。惨剧发生后，我到广州的一家医院探访受伤工人，那是我与中国外来工们的第一次接触。稍后，在1990年7月，我又和好友陈瑜一起，对分别来自湖北省四个村子的受伤工人进行了追踪调查。

正是她所经历的这场能使厂房崩塌，却无法使年轻的打工妹们梦想成灰的大火，使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计划。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确定激励我完成此书的，到底是那些仍然满怀梦想与渴求继续前行的幸存者？还是这场大火以及被它所吞噬的人们？

为了探索女工生命中无法逃避的这些社会暴力，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者主体的漫漫长路，并尝试在当代中国——它正迅速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提出一种社会抗争的次文体（minor genre of resistance）。晓明的生命中不断闪现的火光、疼痛和记忆，凸显出这个时代的创伤，细诉着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会抗争。

这场大火已经过去十年。在迅速走向全球化的中国，当我看到打工妹这个新的社会主体正在奋力挣扎欲出的时候，晓明的生命仍然在我的脑海中闪着微光，忽明忽暗。第一次见到晓明的时候，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身上下几乎全部遭到严重烧伤，唯一幸免于难的那张美丽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明亮而纯真的眼睛。她看上去十分虚弱，但却非常平静。

小孩子喜欢打架，喜欢蹦蹦跳跳，喜欢唱歌。可我喜欢跳舞，所以我想过或许有一天我能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到我们村可不容易了，我们的村在大山里面，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要到我们家，你必须得走上大约一个小时……

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家……

我们那里的人很穷，但是很单纯……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信任。我不喜欢城里人。

我帮父母做了几年农活和家务，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种田，我也不喜欢。每个人都视在“外面”干活很好玩，而且还能赚很多钱。

1990年，我和几个同乡一起离开家来到深圳打工，在一家制衣厂找到工作。那次是我第一次找工作。进厂前，管理者对每个人都要进行面试和笔试，那个时候我真害怕极了。在厂里人人都争工作，争工作的时候我觉

得自己很孤单。

我告诉自己要做个成年人，无论厂里有没有同乡，我都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工厂安排我住在工人宿舍的一个小床铺上，我谁也不认识。那个时候我才尝到了人们常说的那种离家的“滋味”是什么，就是从此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但是刚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大城市、高楼大厦、商店，还有那么多的人……就好像看电影一样。而我自己就在电影里面。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觉得自己特别土气特别单纯。……

但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做得很不开心。厂子是个台湾老板开的，总是拖欠我们工资，本来应该是每个月的第一天发工资，但是他们总是迟发，有时候迟一个月，有时候迟两个月。……好在工资不比其他厂低，我每个月能赚到300块钱。

我是1991年5月离开那间厂的，我表姐介绍我到了现在的这间玩具厂，这个厂很大。……我们干活很辛苦，从早晨到半夜，一天12个小时。每天都累得我精疲力尽。……但在这里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有很多亲戚朋友在这里；我们经常聊天儿，还能互相帮忙。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再想过要跳槽去别的厂。……每隔三个月我都会给在老家的爸爸寄600块钱，也给自己存几百块钱。我觉得自己至少能在这间厂干上几年。

但是后来却着火了，大火……

我从未想到会认识晓明——这个年仅21岁，刚从湖北农村老家出来打工不久的年轻女孩。因为担心唤起她对大火的记忆过于残忍，于是我和她聊起了她的童年、她的家庭以及她在深圳打工的经历。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但在我的脑海中，她的脸庞和声音却依然是那么的清晰。

玩具厂的工作让我觉得很满足。虽然工作特别辛苦，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乐趣。

我们有个计划，打算在回老家结婚之前，大家一起存够钱去北京玩

儿，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梦想啊。

一般来说，工厂大火之类的社会创伤预示着社会暴力，也呈现出打工妹们所承受的来自国家、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张力，在这三种张力之下，一种以阶级、性别以及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剥削形式产生了。分别来自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这三重张力相互作用，彼此强化，构成了中国向全球化生产开放时代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新蛻体（configuration）。尽管这些张力有其自身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但它们正在迅速地发生着转型和重构，正在迫切地寻找新的权力和实践模式来进行社会管治。毋庸置疑，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将中国重新定位为“世界工厂”是跨国资本的一个精心安排。这种安排从一般意义上为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孕育提供了基础（Lee 1995，1998；Jacka 1998；Pun 1999；Xu 2000）。跨国资本向中国的转移，不仅因为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同时还因为这里有大量勤劳、温顺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工，她们更愿意每天埋头苦干12个小时，她们更能适应精益生产方式（just-in-time production）的要求，并且她们还是全球化产品的潜在消费者（Croll 1995；Davis，ed. 2000；Chen et al. 2001；Pun 2003；Yan 2003）。

在当代中国，打工妹的生活必须被放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发展背景之中去理解。中国的社会发展主要由两股相互作用的力量构成：一股力量是国家对社会治理模式以及社会政治工程的变革；另一股力量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资本化和市场化，国家将其冠以“追求现代性”或者“为了全球化”之名，并且提出了要“与全球接轨”的口号。“政党—国家—计划经济”（party-state-planning nexus）模式曾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因素，现在却转变为“政党—国家—市场经济”模式（party-state-market complex），权力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这些都导致中国社会不断地产生各种冲突和紧张，而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抗争也必将随之出现。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革：国家向全球资本开放并导入市场机制。于是，市场和国家联手承包的这项社会工程，使中国社会遭受双倍的创伤。无论是在社会层

面还是在个人层面，国家权力与跨国资本的联姻都将生成新的控制形态。这一次，无论是土地还是劳动，无论是自然还是生命，都被“市场化”为商品出售，而操纵这场“市场化”的，不单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还包括政府。无论怎样，改革时期中国中央权力的“去中心化”以及意识形态作用的式微趋势，并不意味着政府退出了对社会生活的管制（Shue 1988）。相反，在当代中国，陈旧而僵化的户籍制度，地方政府不断扩张其行政权力的狭隘本质，对人口和经济发展的严格控制以及对独立劳工组织发展的种种制约等，无一不决定了无产阶级的生成（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特殊性。

打工妹是城市里的匆匆过客。她们在城市中打工的时间一般很短，平均约为4~5年。这样短暂而无常的打工生活并非她们自己的选择，而是政府与家庭父权制的双重张力所造成的结果。政府通过户籍制度，从结构上将打工妹们的命运与农村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从农村外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们，在城市中无法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例如居住、成家、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等。^① 这导致在城市的工业开发区中普遍采用劳工宿舍制度。通过宿舍制度，用人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和榨取劳动力，而且完全毋须为中国的劳动力再生产等长远问题担心。中国的户籍制度尽管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但它依然牢牢地控制着人口及劳动力，使跨国及私人资本从中受益匪浅。借助户籍制度的庇护，资本对中国劳动力的临时性使用从制度层面上获得了合法性。于是，剥削和掠夺被进一步打上地方性以及文化性的烙印，使深圳以及其他经济开发区的全球化工厂中普遍存在的临时性劳动力使用方式被永久地固定下来。

尽管中国的父权制家庭正随着社会变革发生着迅速改变，^② 但它仍旧严重制约着每一位农村女性的生活道路，尤其是在教育、家庭劳动分工、就业以及婚姻选择等方面。打工妹中的大多数是年轻的未婚女性，仍然要

^① 参见 Dorothy Solinger (1999) 关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和农村人口限定在不同的生活机会和权利中的生动描述和分析。

^② 参见 Deborah Davis 和 Stevan Harrell 等 (1993) 关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家庭形态变迁的讨论。

为外出打工和婚姻自主而进行抗争。通常一到二十五六岁，她们的家庭就会就是否允许她继续留在城市里打工作出决定（Pun 2000）。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如果还不结婚，通常被认为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大多数农村女孩儿都渴望结婚前能够在城市里工作一段时间。大多数打工妹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她们往往为了结婚而辞工并重返农村生活（尽管她们对这种命运并非没有抗争）。而她们生命中的黄金时期（18~25岁），就这样被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所征用、掠夺，以促进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与西方的无产阶级化道路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外来工们并没有针对资本展开过有组织的公开性对抗，也没有能够成长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政府严令禁止任何正式组建独立工会的行为（Chan 2001；Lau 2001）。另一方面，外来工们作为城市过客的两大特点——无常和游离，也给他们在城市中成长为一股集体性的主体力量设置了障碍。然而，尽管一个有组织的打工者主体的形成道路被阻塞了，但是一有机会，外来工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罢工等集体行动。对抗性集体行动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各种反叛性集体行为的产生和蔓延，从一般的劳动反抗一直到日常生活的抗争（Liu 1996；Lee 1998b；Blecher 2002；Perry 2002）。

工厂大火中幸存下来的晓明以及像她一样的打工者们似乎都很清楚自身的处境。晓明很清楚自己将和其他打工妹们一样面临痛苦的抉择：是继续留在城市做一个孤单的打工者，还是回到农村老家去结婚生子。但尽管如此，她和她的朋友们还是另有打算。她们知道结婚意味着要在自己夫家的村子里度过余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到城里打工了。^①于是1992年元旦放假的时候，她们的梦想变成了一个计划：在结婚前大家一起存够钱去首都北京旅游。打工妹们的日常生活策略总是活泼开朗、尽量适应环境以及群体取向的。她们用自己的行动为当代中国书写出一部反叛的诗学（Certeau 1984；Scott 1994）。

① 许多农村地区的已婚女性都争取外出到城市的工业区打工。90年代末开始，外资工厂开始出现已婚女性日益增多的趋势，但是至今尚未有针对这个问题的系统性研究。

于是，晓明开始为自己存钱，到了1993年的深秋，给家里寄了钱之后，她已经攒下了500元钱。但就在那个寒冷的日子里，她的钱和梦想都在那场大火中灰飞烟灭了……

是社会行动者？还是打工者主体？

我们都踏上了现代化的冒险旅程，问题是：我们到底是奴隶？还是背着行囊满怀希望的过客，并且清楚地知道我们必须作出的决断？

——Alan Tourain, *Critique to Modernity*

80年代初，中国开始从僵化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晓明正是在这场社会转型中当上了一名打工妹。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现代性（用更加时髦的词来说即“全球化”）要求中国社会向跨国以及私人资本开放，允许资本主义的制度与关系不仅对中国的经济生活，同时对其社会以及文化生活进行管制。贯穿本书的最主要问题是：在中国追求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变革时期，个体的社会地位与打工者主体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混合体到底对个体提出了怎样的要求？而且，将会出现怎样的新主体、新身份认同以及新的权力—抗争关系？

阿兰·图海纳（Alan Tourain）强调了“全球性”霸权计划的荒谬。他指出，“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接纳了现代性”，“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已被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通讯方式所渗透”，甚至在某些国家，“即使国家领导人公开谴责市场经济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但人民却还是欢迎它”，尤其是那些贫穷者或失业者（1995，201—202）。在中国，政府对这幅现代化蓝图的渴望与外来工们同样强烈。“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决不仅仅是简单地将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通讯方式普遍化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必须更加细致，应该认真而全面地考虑统一与分裂这两股决定性力量（Appadurai 1996）。对这两股决定性力量进行理论化，不能仅是简单地将两者视为对立，而是应该将其视为一对多层次的、交叉

的、重迭的力量，其关系是时而相互配合、时而相互冲突、时而相互退避的。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各种竞争力量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全面现代化”对于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或者个体来说，都是一个太过庞大以至难以实现的工程，那么，以某个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来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选择”，则必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Ong & Nonini 1997；Rofel 1999）。

成为打工妹是“全面现代化”工程中的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Appadurai 1996），它创造出一个新的话语空间（dialogic space），在这个空间里，普遍主义的力量和历史特殊性及文化差异性的力量相互碰撞，并建构出一个新蜕体。打工妹这个新型主体的系谱学的建立得益于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自我形塑技术（self technology）”的洞见。在这个概念中，他明确提出要关注“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的一系列程式，它们要求或规定个体需要通过自我主控或者自我形塑的知识体系（self-knowledge）来确定、保持或者改变其身份认同（1997，87）。福柯主张研究主体的形成历史与政治管治形态这两大主题之间的互动关系（同上，87—88）。关于主体性，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主体是如何在不同时间、不同制度背景之下作为一个可能的、适当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对象被建立起来的呢（同上，87）？关于政治管治的分析，最根本的问题不单只是对一般的“权力”概念进行批判，抑或仅将其作为一组关注他人行为的战略性关系来分析，而是要将其视为个体通过与他人关系的扣连（articulation）而进行的自我管治（同上，88）。然而，福柯关于自我形塑技术的系谱学研究过分注重细致的个体化技术，这反而使他关于“扣连与他人关系”的论述没有被凸显出来。如果个体化真的是塑造现代自我的“技术”核心，如果真的像许多人期望我们相信的那样，个人需要掌握一种塑造现代性自我的重要技术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是时候对这个过程进行追溯了。对这个过程的追溯，不能只是简单地两分为东方情境或西方情境，而是要呈现出这一主体化过程，是如何将使孤立个人的个体化过程与关系性或群体性的主体塑造过程都涵盖其中的。

那么，是否由于中国人主体比较强调关系性，因此西方情境中，使人

不断走向孤立的个体化模式对于认识中国人主体及其现代性就没有参考价值呢？答案是否定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现代自我的建构（现代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特定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个体向产业工人的转变，都会同时受到以下两个过程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强大的市场力量加速了中国人个体生活的孤立化，另一方面是关系、同乡、血缘、家庭、性别、年龄以及婚姻状况等因素作为社会力量的重新出现（Honig 1986；Hershatter 1986；Perry 1993；Yang 1994）。当晓明被安排到制衣厂的生产线上，面对管理者的检查和监控的时候，对于她来说，无疑已经发生错位——离开了家人，离开了和她一样正在争取工作的同乡，独自面对资本的要求，于是她的自我形塑技术被引向了个体化。打工妹最初进入工厂的过程，就是一个对自我进行个体化的过程，即让个体意识到从此就只能依靠自己了。这是一场社会抗争，是一场要当上打工妹的抗争，也是一场孤军奋战的抗争。晓明曾经告诉自己要学会做一个成年人，无论身边有没有同乡都要自己照顾自己。事实上，在打工妹们的日记、书信以及各种文字作品中，孤独是个不断重复出现的最重要主题。

将主体孤立化和个体化当然是资本的计划，然而，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当代，嵌于社会关系或者从文化资源中表现出来的集体性实践模式，都是打工妹们不屈不挠地抵抗市场力量的日常策略。20 世纪初期，在上海和天津的一些工厂里，成立同乡会是产生社会身份认同（尽管是片面的、流动的、易变的）的一种重要手段，并因此而出现了一些或者公开或者隐蔽的社会行动（Honig 1986；Hershatter 1986；Perry 1993）。^① 在当代中国的外资以及其他类型的工厂中，打工妹们仍然是被紧紧包围在同乡和亲属网络之中的，尽管这些网络经常是被重新想象和建构出来的，但是它们却给打工妹们提供了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支持。打工妹们最看重一个人的所属族群（例如是广东人，潮州人还是客家人等）或所来自的地区（例如是四川人、湖南人还是湖北人等）（Tam 1992；Lee 1998a；Pun 1999）。扣连同

① Emily Honig (1986)，Gail Hershatter (1986) 和 Elizabeth Prey (1993) 都精辟地论证了在二十世纪初期，同乡关系是中国打工者主体形成的核心。

乡身份，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表现，是经常被打工妹们用以对付资本将其进行个体化之阴谋的一种策略。因此可以说，打工妹主体的形成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个是使个人不断走向孤立的个体化过程，另一个是形成某种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群体形态的过程。

对于嵌入在特定家庭关系之中的打工妹们来说，其生活道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她们的家庭。但同时，中国父权制家庭制度的变迁，也为她们的生活改变提供了支援。正如 Stacey (1983)，Andors (1983) 和 Wolf (1985) 曾经指出的那样，父权制关系没有真正被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改变过。在毛泽东时代，父权制家庭的维系主要通过两种手段：一是男女结婚后通常是女方入住到男方家，二是在家务劳动和受薪工作方面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到了后毛泽东时代，父权制关系依然不断地重复和展现：公然歧视女婴，将女性视为次等性别，要求她们 20 岁一过就要出嫁等，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David & Harrell 1993; Croll 1995)。中国女性作为女儿和妻子的命运中，充满了挣扎与反抗。尽管她们针对父权制家庭制度展开集体性抗争的相关记载凤毛麟角 (Sheridan & Salaff 1984; Judd 1994)，但是她们反抗家庭决策，争取工作或婚姻自主的、充满辛酸的个人行动却是数不胜数，在工厂中比比皆是。尤其是那些从父母或丈夫身边离家出走，跑到工厂里打工的女人们的故事最为打工妹们津津乐道。是继续留在城市打工？还是返回农村老家？这是打工妹们都将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尽管她们总会在这两者之间举棋不定，但是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将打工作为第一选择，她们渴望能够在城市中停留尽可能长的时间。尽管如此，只要打工与回家之间的冲突还不是很明显，那么，她们一旦在城市中遇到什么困难或问题，家人和亲戚仍然是她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依靠。这些家庭关系以及她们的文化实践，暂时性地遏制了资本对个人所进行的个体化进程，并将一种文化差异性注入到主体化过程与中国的现代性之中。

在我开始着手打工妹研究的时候，除了借鉴福柯的“自我形塑技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以及性别与劳动的女性研究之外，我还参考了阿兰·图海纳的著作以及他所提出的“社会行动者”的概念。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场急剧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中，像晓明这样的外资工厂的打工妹们是经历这场转型的先锋之一。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打工妹是生活在变动社会中的一个游离的主体，她们的声音决不会轻易被任何主流话语（无论是知识话语还是政治话语）所湮没。安·阿纳格诺斯特（1997，17—44）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让底层阶级说话”是中国20世纪初期现实主义文学所进行的一场革命。尽管在当代中国，阶级分类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新型打工者主体的形成却仍然要比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看法——经常把主体视为纯粹抽象物或者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的结果——要复杂得多。

中国的打工妹们正在对其生活道路进行着经历、体验、想象和反抗，由于这个新型社会主体的抗争是丰富、独特而多元的，因此她们的抗争不应该再被简化为传统政治化的“阶级斗争”。中国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和资本的论述稀释了阶级话语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分析已经过时，事实上，一切并不那么简单。在当代中国，资本和新兴精英阶层正在试图对社会结构与关系进行重构。为了给强调个人主义、专业分工、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铺平道路，阶级话语受到彻底压制。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被双重地掩盖，首先是被国家，然后是被市场。在急剧变革的当代中国社会，对工人阶级历史的双重掩盖使工人主体实践的意义无法呈现出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

即使工人阶级的分析作为一种社会抗争的武器是有效的，那也只有当它扎根于底层经验之时才能令其重振旗鼓。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分析只有在中国打工者们自身抵抗资本与市场的日常政治（infrapolitics）中才能发挥作用。^① 深陷于三重压力的图囿之中的打工妹们，必须要活出她们自己的主体经验，作为其生活抗争的一部分。如果说，中国的底层曾经被主流话语伤害过，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交汇处出现的新型主体——打工妹，则正在翘首盼望着工人主体性的归来。

① 正如 Elizabeth Perry（1993，4—5）所指出的，“劳动政治是劳动者自身：他们的籍贯、性别、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诸如此类”。